

明末清初的学风

谢国桢

一 叙说 社会的背景和思想的根源

近年来明末清初的学者很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在1963年间，继王船山学说讨论会之后，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都举行了顾亭林35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叫我发言和写论文，以我学问的浅陋，是当之而有愧的。不过，我想明末的学者当不仅止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所谓明末清初的三大儒；而是当时的学者人才辈出，著作如林，在学术史上都占有应有的地位。为什么在这个大动荡时期，产生了这如许多的学者，在学术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尤其是象顾、黄、王诸家的学说，不是孤立而产生的，不可不谈一下明末清初的学风。

在吾国学术史上，有划时代的几个时期，呈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像春秋战国先秦诸子、西汉经学、东汉党锢、魏晋哲学、宋元理学等，其在程度上和性质上各有不同，而且各有特殊的作风。我认为明末清初的学者，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风格，有东汉党锢坚贞的气节，摆在历史的进程上，有并

驾齐驱的局势，承前后推陈出新的作用，从明清以来封建社会黑暗的统治中，在人民群众的思想舆论上又发出光彩，可以说是在吾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开了灿烂的花朵。

我所说的明末清初学者所处的时期，是指着公元 17 世纪，即明万历三十年以后到清康熙四十年左右（1602~1701）。这百年中，在这个时期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非常众多，有的是已经家喻户晓；有的是经过清朝统治者的毁禁，是否是尚在天壤间，正在于发掘和整理。我们有这个责任，写出一本《明末清初学术文化史》的；但我知识浅陋，理论水平低下，又限于时日，仅就我平日读书的所得，把当时社会的背景，思想的根源和近年来学者研究的成果，综合论述，试图概括地说明明末清初学风中的几个特点，作为发轫之始，供诸大家商讨。

学术思想是时代的反映，明末清初的学风，为什么会有这样豪迈的风格，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多种多样的体裁？我认为固然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条件，同时又由于明末农民的大起义摧毁了明朝的腐朽政权，也有有力地打击了满洲贵族。这个时代正是当时人士所谓“天崩地解”的时期，农民群众做出了当家作主人的豪迈气势，谴责统治者的贪婪罪行，如同解剖一样，把社会上阴暗的一面，都暴露出来，从而使比较前进的头脑的人士触目惊心，写下了篇章，反映到学术思想、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方面，因之其中以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意识为其主要的促成条件，同时也有其他及外来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相互交织而成的。概括起来有下列的几个原因：

(1) 由于明中叶以来社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在运河两岸以及江南一带出现了很多小村镇和城市，商店小手工业作坊到处皆是^①，这些地区的商业经营，虽然不脱封建社会自然经济

^① 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赵世卿奏疏》。

的范畴；但是已经有脱离农业生产的小手工业者、经营小手工业作坊的商人和雇佣工人的出现。又由于当时交通的便利，苏松棉织品和丝织品，江西的陶瓷，西北的毛织品可以销行到全国。全国的大都会北京和南京以及苏、松、扬州等地既为政治、经济的中心区，也是文化的城市，尤其是南京为明朝的留都，各省的人士都集中到南京来，成为人文荟萃的区域。还有扬州为明朝经营商业的城市，许多徽州商人都迁居扬州，有些成为小市民中的知识分子。所以在明崇祯间复社在苏州虎邱开会，到会的成员就有两三千人，复社的人士在留都驱逐魏忠贤余孽阮大铖，贴出了“南京防乱公揭”，列名的就有好几省的人士，这说明明末各省人士，能够荟集在一起，是与明末的商业和运输交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明末遗民钱秉铎赠方密之江上纪事的诗，有“武昌公子束装轻，便寄扬州估舶行”^①的诗句可以作为证明。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明末学风兴起的社会背景；至于资本主义萌芽是如何的产生，不属于这个论题之内，就不再多谈。

(2) 明自正统以来土地的大量兼并，庄田的兴起，皇室有皇庄，又有王府庄田和勋戚庄田，告老的官员地主豪绅也田连阡陌以千百顷计。农民自耕的土地面积很少，所谓：“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② 吴中一地如是，其它各省情形可知。随着万历以来江南各地商业经济的发达，更刺激了统治者的胃口，统治者以矿税为名，派宦官到各处去敲诈和勒索，激起了各省反矿税的斗争。又兼着江南各地地主豪绅虐待耕田和家内使用的奴仆（佃农），大江南北普遍发生了所谓家内奴仆的暴动，当时所谓“奴变”，尤其是陕北边塞荒寒受灾害最

① 钱秉铎：《藏山阁诗存卷一·过江集·同方密之江上纪事》。

② 顾炎武：《别本菴中随笔》卷2上。

多的地区，在1628年（崇祯元年）终于爆发了西北农民的大起义。从阶级立场上来看，在封建社会内地主阶级中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同情于农民起义的，虽然农民起义伟大的举动，活生生的事实摆在这里，他们却说农民军的起义是“假行仁义”^①，甚至骂农民军为“盗贼”和“流寇”。明末遗民屈大均等所写的《四朝成仁录》等书，把明末死难之士，死于“贼”和死于“虏”（满洲）的等量同观，均称之为杀身成仁的志士。因为农民军把明朝士大夫所崇拜的偶像——崇祯皇帝逼的吊死在煤山，而称农民军为仁义之师，是不合于当时情况的，象四川学者唐甄曾比帝王如盗贼，又说崇祯帝是一个暴君，就受到他的朋友王源的訾议。尽管如此，明末党社中的人士与当权的官僚们虽同属于地主统治阶级之内，但统治者经常痛恨“处士横议，品核公卿”，甚至于骂他们为盗贼，范曄《后汉书·党锢传》上不是说过吗？“党锢久集，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明末保守的理学家张履祥也说：“东南坛坫，西北干戈，其乱一也。”当时还有人说，社集的号召，群众的景从，而且他们彼此之间的契合，一呼而集，实与盗贼的行为无异。党社中的人士，他们自认为与农民起义的群众有所区别；可是统治者却认为社集中人士评论朝政，干犯公卿，与盗贼的行为，同流合污差不了多少，这是应当如何理解呢？从下节里的分析，就可以明了这个原因。

③ 当时党社中人士从阶级成分来说，东林党的成员，大半出于地主阶级的上层分子，地主阶级也有开明派和保守派，东林党是属于开明的一派，同时其中的成员如李三才、顾宪成又是江南的地主而兼营工商业者。东林党人为了维护明朝的统治政权，要改良朝政，澄清吏治，李三才所上的《请罢矿税的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1。

奏疏》、周顺昌等请制止矿使四出骚扰的暴行，这是与其本身所经营的江南工商业利益有密切之关系的，至于复社的成员大半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中下阶层，有时还参加了出身于工商业中间的知识分子，从其本身来说就有切己的利害，在其主观愿望上虽然维护其本阶级的利益，但是间接的同情于人民，有其积极的一面，遂得到人民群众舆论的支持。人民群众的利害与统治者的要求是对立的，正如顾宪成所说：“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①在统治者看来“东南坛坫和西北干戈”，就等类而齐观了。但是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是软弱而无力的，不能起来反抗统治者的政权，终于受到统治者的宰割，目为党人而以禁锢了之。

由于明朝统治者的种种暴行，掊克峻敛，西北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针对着当时的弊政，提出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口号，做出了改变明朝的行政机构和“改正文体”等等措施。农民军这样轰轰烈烈的运动明朝的士大夫是不能充耳不闻的。尤其是读书人士，他们虽然不能同情于农民军，但是知识分子思想是敏感的。明末的前进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对于当时君主的庸暗，土地的集中，赋役的剥削，对于新兴的手工业和商业的摧残，五蠹吏胥的虐民，科举的腐败，都有所认识。在顾炎武所著的《日知录》、《别本菰中随笔》，黄宗羲所著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所著的《噩梦》和《黄书》，抨击了当时的朝政，提出了鲜明的主张，做出了足够的论述。明末的学者与农民起义在其阶级立场的本质虽有不同，但是维护其本阶级的利益而与劳动人民同受其害时，可能说出些公平的话来。所以当阶级矛盾转变而为民族矛盾之时，明末的前进人士可能同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

情于农民军。当山东农民谢迁攻克淄川，惩治了汉奸孙之獬，处以死刑，明末的大儒顾炎武听见了这个消息，就为之赞叹不置，做出了“鼓逢逢，旗猎猎”^①这样赞美的诗句。像阎尔梅、叶廷秀等人有可能参加山东榆园农民军从事于共同抗清的运动。明末农民军的大起义，摧毁了明朝的腐朽政权，有力的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这伟大的事实，影响于人民的脑海中，遂成为明末人士思想言论中的主题了。

(4) 祖国人民在学术文化上有优良的传统，他能够容纳众长而扬弃其所短。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丰富了明末学者的思想内容，对于旧的起了怀疑，更提出了新的主张。同时在 16、17 世纪，海外侵略者的东来，以天主教迷信色彩来麻痹人民，可是附带的也带来了欧洲比较新颖的科学知识，在吾国对于哲知和封建社会的伦常道德上的义理之学已有理论的根据，但是对于“制器尚象”自然科学和物理学等，尤在幼稚时期，明朝的学者自徐光启、李之藻以后，出现了像梅文鼎、王锡阐、孙兰等杰出的天文算学家，接着像王征、薄珏等人阐述了物理学和机械学，写出了《奇器图说》等书，对于农业生产技术上深有所发明，在天文、历法、水法、火器、机动物理学上都有新的成就。这都不可以不说是受外来的影响。但是明末的哲学家方以智就深刻地看出西来传教士的弊端，他说：“万历年间泰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志士推之，彼之质测尤未备也。”^②这就是说泰西的学问长于“制器尚象”而不长于明理，就是他们质测的方法做的还是不够的。同时，又有一位学者，名叫孙兰，他曾从泰西人汤若望学习天文地理，著有《柳庭與地隅说》，他就怀疑到汤若望曾灌输给他耶稣会士的教旨，而不大愿

① 佚名：《研堂见闻杂记》；顾炎武：《亭林诗集》卷2，《淄川行》。

② 方以智：《物理小识·叙例》。

意教他天文历算之学。因之他断然地说：“常谓西儒以七克为教，似近于孔门克己复礼。然接其人，聆其论，咸精于历数，合于制器尚象之旨；独膜拜天神，侈言天堂地狱，则异教也。”^①“精研西学而不师其教”，从而说明了我国的学人，能够采纳众长而扬弃其短。当时的学者是受了当时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和农民大起义声威的影响，批判地接受了外来的影响，迂回曲折，反映到学术文化上，遂蔚成为明末清初的学风。

二 明末社集和明末遗民所产生的学风

我们要谈明末清初的学风，不可不先谈明末的党社运动，在1604年即明万历三十二年间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所创办的东林书院，反对他们的人就叫他们做东林党。东林书院讲学的宗旨，在于评论朝政，衡量公卿，“论学以世为体，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②。东林党中，峥嵘露头角的人物，出现了杨涟、左光斗诸君子，与反动的阉党展开了不懈的斗争。继东林而后，就是以张溥、张采等所创办的复社，明末的遗民和学者，多半出于复社中的人士，当时有“小东林”之称，可见东林与复社是一脉相传的。明末清初的学者距东林讲学的时间较晚一些，所以我在这里对于东林党暂且不谈，而概括地介绍一下明末的社集。

明末士子的结社，所谓社集，起于明崇祯的初年，迄于清康熙的初年，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但明朝士子结社的风气不始于明末，明朝的读书人士以文会友，诗酒唱和，提倡风雅，南京为明朝的留都，人文荟萃之

^① 孙兰：《柳庭與地隅说》。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8。

地，自从明嘉靖以来，白下青溪，结社之风已经很盛，见于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到了天启末年太仓人张溥、张采，苏州人杨维斗等所创办的应社，其初的目的也不过是为着士子应付考试，猎取功名，大家聚集在一块学习经义，揣摩风气，作为进身之阶。张溥等人很有抱负，认为这样做还不够的，必须集合多方面的人士，砥砺名节，“共兴复古学，将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改名为复社”^①，他们还“刑牲而盟，告之天地，倚盖终身，砥砺期许”^②。因之社集，当时又叫做“社盟”。当时称江西安徽等地叫上江，苏松和浙东西等地叫做下江。于是会合了大江南北各地方的社集，“因之云间有几社，浙西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朋大社，金会于吴，统合于复社”^③。当时有气节而知名的人士像几社的领袖陈子龙、夏允彝，皖中的名士吴应箕、刘城、方以智等人，都参加了复社。在1629年即崇祯二年成立了尹山大会，从崇祯二年到五年在南京和苏州的虎邱共举行过三次的大会，到会的同志见于《复会姓氏录》的共有2025人，终于在1638年即崇祯十一年复社的成员聚集在南京，为了驱逐阉党余孽阮大铖，公推东林子弟顾杲、天启被难黄尊素之子黄宗羲为首，宣布了《留都防乱公揭》，扶持正义，制止了阉党余孽的猖狂进攻，这可以说是复社作为领导的社集初期。

1644年5月汉奸吴三桂勾引清兵进入北京，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权，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掌握了政权，史可法被逼出镇扬州。马、阮辈要排除异己，想把党社中的人士一网打尽，

① 陆世仪：《复社纪略》。

② 陆世仪：《复社纪略》；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③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并参考汪有典：《史外·吴应箕传》。

复社的成员曾经有在北京参加过大顺农民军的，说他们背叛朝廷，就制定颁布了“顺案”，把周铤、雷演祚处以死刑，其他分为降顺、附逆六等，以次论罪，但是对于投降清朝的却不论罪，迫得社集中人士东逃西散仅免于难。当时有骨气的人士象陈子龙曾任弘光朝的户科给事中，他认清要恢复明朝，只有积极图强，走向抗清这一条道路，一月之中，奏章上了数十次，不能见用，知难而退，归隐松江。嘉定的进士黄淳耀等，感觉到弘光小朝廷不足有为，干脆隐居田园，讲学鸣志，策励后进。可是腐朽的弘光王朝不过一年就垮台了。扬州南京相继沦陷，清兵急转直下，南进江南，这抵御的重任只有落在人民群众的双肩上。于是1645年的六七月间，清兵直下江南之时，嘉定的进士黄淳耀和侯峒曾等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坚守嘉定抗拒清兵，几社领袖陈子龙、夏允彝也起兵松江，明末大儒、复社成员顾炎武和吴其沆等起兵昆山，大江南北起义抗清的领导者，大半出于社集中的人士，尤其是陈子龙曾做过绍兴推官，浙东抗清的将领，如钱肃乐、张煌言与复社和几社有密切的关系。这时社集中人物由统治阶级内部反阉党的斗争转变而为以民族矛盾为主体的抗清斗争；这与明末的农民起义军由阶级斗争转变而为民族的抗清斗争相比较，他们的阶级立场上虽有不同，可是其目标上是一致的，这可以说是明末社集的中期。

到了乙酉、丙戌（1645～1646）以后，江浙等地已入清朝的统治范围，可是自从1648年荆襄十三家军和李定国所率领的大西农民军，以及郑成功所率领的海上之师，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清战争，各地方的志士仁人都参加了英勇不屈的抗清战斗，就是在清军占领区内，不仅在江南，而且在河北山右的革命志士也图谋恢复，积极响应，参加支援川陇、海上义师的工作。清朝政府寻找发生事变的根源，不得不注意于士子的结社，于

是在 1660 年即清顺治十七年颁布了严禁社盟的命令，因之当时有心人士就由公开的结社转变为地下秘密的活动。尽管在清朝禁网之下，从顺治十年左右到康熙初年，各地人士仍然秘密结社。就其显著的来说吧，以我所知道的，在苏州就有叶恒奏、顾炎武等所举办的惊隐诗社，在淮上就有阎修龄等所举办的望社，在宁波就有六狂生陆宇燝等所组成的两湖八子、南湖九子等社，在广东就有屈大均为首所创立的西园诗社，在沈阳就有僧甬可等所结合的冰天诗社，沈光文等在台湾所结合的海外几社，他们或是积极响应海上的义师，或是蓄志密谋作恢复的事业，甚至影响到东北和台湾。结社运动表面上是缩小了，而影响的范围却是扩大了，这可以说是社集的后期。

我们从上面所说事实来看，复社为什么能集合各省的人士，参加的成员到二三千人？同时明末的结社前后相继延续到四五十年之久？是否是可以说是像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党，我们不能这样的来谈；但是明末的结社有它的组织，有它的目标和企图，这是可以断言的。当然复社人士在金陵大会的时候在那里画舫笙歌，酒食争逐，是地主阶级士大夫颓废的作风，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只从消极的一面去看，而也应当从积极的一面来谈，我们从其组成的情况来说吧，复社开大会时所召集大江南北的成员，在 17 世纪的时代，虽然交通较前便利，但路途还算是遥远的，为什么能一呼而集呢？陆世仪在《复社纪略》就说到：“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天如于是褒十五国之文而诤次之。”朱鹤龄《愚庵小集·传家质言》上说：“庚午、辛未间，复社盛兴，舟车之会，几遍海内，每邑以一二入主其事，招致才隽之士，大集虎邱。”这是说明了复社有了组织。当然在那个时期，只是充当招集者，有了彼此联系的关系，他们的组织还是很幼稚的。

复社的形成，还有他的宗旨和目标，他们既申之以盟誓，

还规定了立身处世的方向和诺言，复社的盟词上说：

“毋蹈匪彝，毋读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①

他们彼此之间称同志。明末湖北天门县的学者郭都贤，史可法和魏禧都出于郭氏之门，都贤与宁乡陶汝霖为最要好的朋友，都贤给陶汝霖所著《褐玉堂集》的序中有“有生同里，长同学，出处患难，同时同志”^②的语句，这可以说明了当时对于同志的意义。

在“出处患难，同时同志”感情融合和共同了解生活的基础上提出了规劝和互助。我们在这里可以举出一两个鲜明的例子：例如以文学豪迈著称的侯方域，黄宗羲看见他生活过于浪漫，不以为然，就规劝他说：“你的父亲还在监狱里，正当痛定思痛，怎应当狎妓侑酒呢？”^③南昌张自烈在南京读书，家境贫寒，社友们就集资帮助他结了婚姻。可是张自烈不因为私惠而失去规劝的原则性，他规劝复社的眉目杨维斗，以他这种地位声望还喜欢迷信礼拜北斗。他又规劝社中同人正当发奋有为之时，不可狎比声伎^④。比这稍为晚一点的时期，钱塘有一位有骨气的人士，叫做汪汾在那里隐居陋巷，穷困自守，黄宗羲特为从余姚来看他，在寒夜里两人拥一条被褥，抵足而谈。宁都魏禧也从远方来访问他，汪汾却拒而不见，经过解释之后，他们两人才定交而去^⑤。由这些例子，可以说明了社集中人严定了界限，是非分明，养成坚贞不屈的节操，而蔚成为一时的风气。

① 陆世仪：《复社纪略》。

② 李元度：《先正事略·隐逸》。

③ 黄宗羲：《思旧录》。

④ 张自烈：《芭山文集·书牒》。

⑤ 李元度：《先正事略·隐逸》。

黄宗羲经常以东林党人的后裔来勉励自己，他在灵岩集会的诗句说：“应怜此日军持下，同是前朝党锢人。”他们的行为，可以说是置诸《后汉书》的《党锢传》中当之而无愧的。

如今我们再从明末的志士，由社集的作风而影响到行动上来说，如上所述的几社领袖陈子龙，在松江起义之后，始终不渝的抗清，在1647年即清顺治四年，由于清松江提督吴胜兆的反正一案而被逮捕，陈子龙在途中投水自沉，清廷仍斩戮他的尸首。陈子龙的学生王澐奋不顾身，经营陈氏的身后，埋葬了陈子龙的义躯而完成其抗清的大节。当乙酉、丙戌（1645～1646）之际，浙中的义士拥立鲁王在绍兴监国，在这战役中的砥柱钱肃乐兄弟七人都参加了抗清的战争，以身殉国。鲁王的名臣张煌言与郑成功在一起联师北伐，为了完成恢复疆土的任务，他的全家均被清廷所逮捕，虽然是妻子满狱，他毫不顾惜。鄞县的志士，当时所盛称的五君子华夏、董守谕、屠献宸等为了接应四明山寨上的义师进入宁波，事败之后，全都壮烈牺牲，妻子流徙，明末遗民林时跃不顾艰辛掩护了华氏的孤儿。还有苏州灵岩山的退翁（释弘储）和尚支援浙东山寨中的义师，被清兵逮捕，下了监狱，徒众四散，庙宇无主，他的弟子董说释名南潜，独从之不去，兴复了丛林的烟火。其他如慈溪志士魏耕、陈三岛等在山阴祁班孙家的寓园四负堂中，潜谋响应郑成功的海上义师。以上所举的也不过是显著的几个例子，但是在这些事实内可以说明一个问题。正如复社的领导者张溥所说：“忘其身惟取友是亟；义不辞难，而千里必应。”^①在旧的封建道德伦序之内而增加了师友互相切磋同志中间的关系，是极其值得注意的。

^① 参考李元度《先正事略》；全祖望《鮑琦亭集》卷16，《退翁法师第二碑》；陆世仪《复社纪略》。

我认为明末志士和不与清朝合作、清朝统治者所称道的“胜国遗民”，他们不是世俗所谓的“遗老遗少”之流，他们胸怀是开阔的，志气是昂扬的，并且还赋有自信不疑的乐观情绪，从明甲申乙酉以来到康熙的初年，参加社盟的人们都由壮年而到老年了，他们决不因为目前的失败而灰心。黄宗羲的胞弟黄宗炎，教导他的门人说：“诸君但收拾聪明，归之有用之一路。任达之士，托情物外，则自谓有观化之乐，故鼓缶而歌；不然忧生嗟老，戚戚寡欢，不彼则此，人间惟此二种，皆凶道也，君子任重道远，死而后已，卫武公之所以贤也。”黄宗羲另一位胞弟黄宗会，他反对遗民做和尚，他说：“不为异姓之臣，而甘为异姓之子乎？”还有一位明末的遗民，东台人王大经以为不要认为遗民为无用，他曾著有一篇《许由论》，他说：“……虽然尧舜以有用为用，而许由巢父以无用为用。终不可谓尧舜有巢许之心，巢许遂无尧舜之用也，是故尧舜巢许者皆治乱之圣人也。”^①因之清代史学家全祖望综核评量明末遗民的行动，述布衣周西所著的《防秋谱》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说：“有时世事多端，天地帝王皆不能支，独余处士以持残局，而兀然能为中流之一壑。”^②他这种说法，阐述了明末遗民赋有积极的一面。至于明末遗民半为僧，多托迹于空门和作黄冠道士，这应如何理解呢？傅山的诗句上不是说过吗？“山中不诵‘无衣赋’，遥伏黄冠拜义旗。”全祖望称述退翁和尚是以忠孝作为佛事，从这句话看来，就可以明了他们当和尚道士是作为掩护其志谋恢复的企图，而非其本愿的。但是清朝统治阶级的士大夫们特别强调明末遗民退隐深山，甘处于荒江老屋之中，脱离现实颓废的一面，贬低了明末遗民壮志不阿的气节，是不合乎事实的。

① 李元度：《先正事略·隐逸》。

② 全祖望：《鮑埼亭集》。

三 明末的学派

如上所述，明末抗清志士，留下可歌可泣慷慨悲壮的事迹。当抗清战争退入低潮，在清朝铁蹄严威统治下，明末遗民中素来赋有气节的人士，便就改换另一种方式，以口诛笔伐作为武器，进行宣传以民族矛盾（“华夷之辨”）作为主体的思想，与清朝统治者作不懈的斗争，这样在民族革命的基础上，经过明末学者反复讨论和钻研，不仅在书本上，而且身经患难，从实践阅历中得出来的结论来启发后代。在这一特点上，就蔚成为明末清初的学派和学风。

但是明末的学者，终究属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从阶级立场上来分析，虽然同情于人民，然终是维护其本阶级之利益的，就其本身来说，可以分为顽固保守和开明前进的两派，关于保守的一派，在下面再谈，这里要谈的是开明前进的一派。

我们所说的明末清初的学者属于开明激进的一派，其学风是在“天崩地解”的时代变化当中，同情于人民，而符合于人民群众的愿望所形成的学风，如人所同称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明末三大儒，就是当时学风中的代表者，在这个时期，所以有这个学风，正是“人们底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学术思想是时代的反映，因为他们有当时共处的社会环境，有共同奋斗的目标，有彼此相互之间师生行辈的关系。在复杂的社会矛盾当中，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思想有相同之点，也有相异之点，不谈每个学者在当时学术上所起的作用和学术的特点，固然不对；但是强调个人，或是仅了解其一隅，孤立的看问题，而不明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当时的学风，这就像见树而不见林的样子，也是不可以的。

复次，我们谈人而不可离群而索居，所谓：“德不孤必有

邻，”当时社集中人，由于互相帮助，“激浊扬清”，砥砺了名节；同时明末清初的学者所以自成为体系，这与明末讲学的空气，是有其直接的关系的。

自东林讲学之后，首推戴山（刘宗周）、漳浦（黄道周）和关中的冯少墟（从吾），他们的弟子几乎遍于海内。继戴山之后，戴山的高弟黄宗羲创立证人讲舍，讲学于浙东的语溪和甬上。北方的耆宿孙奇逢讲学于河南辉县的百泉，山西太原则有三立书院；傅山和戴廷枏均是出于三立书院中的最著名的学者。在浙江余姚则有沈国模、管宗圣等所创办的姚江书院。起于崇祯末年一直到康熙初年，支持了三四十年弦歌之声不辍^①。在江西南昌就有豫章书院，宁都魏禧兄弟朋友所组成的易堂九子之会和谢文洊的程山学舍^②，这不过举几个荦荦大者的讲会，在这些讲会中出现不少卓绝的人才，在其讲学的宗旨和趋向上，形成了各家的学派。

在当时人所称道的明末三大儒是指着孙奇逢、黄宗羲和李颢而言的。顾炎武之避祸远游北方，不与当时所谓闻人显官相接触，不喜欢表暴自己，他与朋友的信上说：“第三十年来，并无一字流传坊间。”^③王夫之窜身徭峒，潜学自修，更不为当时显赫所注意，他们的学术地位，都为后来人民群众所推崇，就把顾黄王三家称之为明末三大儒。明末的学者所以为人民群众所推崇，在学术上有崇高的地位，就在他们扶持正义，坚持真理，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对于事物抨击旧的而提出了新的和比较正确的看法。明末的学派如果分析起来大体上是这样的。

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以实事求是为宗，因为避祸北

① 邵廷梁：《思复堂集·姚江书院记》。

② 钱林：《文献征存录》。

③ 国粹学报《第一年》，顾亭林佚文。

游，接交北方的豪杰，当然多属地主绅士中的开明人士；但北方潜修之士，都被他表彰，他的活动范围，多在北方。黄宗羲整理宋明以来的学术思想，长于天文算学，提倡民主的学说，他的讲学的范围，多半在江南和两浙。王夫之潜修明理，他与方以智等在学术思想上对于宇宙观和人生观都有卓越的见解，初步提出了朴素唯物论的思想，西南的学风都受其影响。太原傅山把周秦诸子、老庄的哲学与孔子等量同观，把儒家维护封建道德伦序的礼法和名教，都予以批判和新的认识。关中李颀主张悔过自新，自我改造，他的教学方法，很能接近群众，认为农工商贾皆可以造就成为学者。容城孙奇逢讲学百泉，虽然宗陆王之旨，但是他素有匡时济物之旨，有北方豪侠之风。同时新城五公山人王余佑有雄才大略，他认为讲学不可以不知兵，他与祁州刁包最为志同道合，同以坚贞不阿的气节，拒绝与清廷合作，与群众在一起，从事于农桑和守御之方，天下一旦有事，可以坐而言而起而行。北方有这些学者，遂养成为注重实践实行，提倡“六府三事”水火兵农并重的颜（元）李（塏）学派。同时启蒙的学术思想家和物理学家桐城方以智和他的儿子方中通、方中履以及他的学生杨宣等，对于天文地理、算术、物理等项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明末清初时期，成为桐城方氏主要的学派，因为他们的著述，正在逐渐地发现，正待于有人发掘和探讨。他们和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与以魏禧为首的南昌易堂九子也取得了联系。宁都魏禧虽然以文章著名，但是他讲学以致用为宗，好评论古今成败得失，他认为学问必须通过阅历和实践，不能师心自用，闭户造车决不能出门合辙。当时所称的易堂九子，魏氏兄弟和他的朋友邱维屏、王猷定等，互相劝勉，他们讲学之风，影响的方面很广。大兴刘继庄，和颜元的弟子王源都受到他们的影响。南昌梁份更发展而为从事实际的调查，研究山川险要舆地的学问，学风所被，与北方颜李

学派也有密切的关系^①。这种潜伏在社会底层中讲学论道呼吸相通的一种学风和力量是应该提出来讨论的事情。四川新繁费经虞费密父子反对程朱道统的学说，达州唐甄阐扬社会平等的理论，他把君王与盗贼同观，提出了“不能胜暴即不能除暴”的新颖思想。余姚朱之瑜与张斐，虽然宗阳明之学，可是他们明辨是非，守正不阿，他的学风影响到日本。南海邝露素习兵法，具有文学的天才，他身处广西，于其诗歌之中，颂扬了西南兄弟民族纯挚优良的事迹。其他像张履祥、陆世仪等虽然尊崇程朱，可是他们注意到农民的生活和具体分析程朱陆王学术思想之优劣，均有独到的见解。黄宗羲是崇尚王学的，但是他批判地接受了阳明学派，揭出了阳明天泉证道“四无之教”主观唯心论症结之所在，取其所长而弃其所短。吕留良是尊崇朱学的，可是他认为朱子之学，自从到元初许衡、吴澄等人出来“辱身枉己”^②，丧失了民族气节，朱子之学已失其传。这是说明了明末开明前进的学者与清代的伪道学家陆陇其、熊赐履、李学地等毫无相同之处。这就是如上所述的亭林、梨洲、船山、百泉、百原、二曲（李颀）、颜李、桐城（方氏）、宁都、广阳（刘继庄）、晚村、新繁、达州、舜水（朱子瑜）、扬园（张履祥）诸家成为明末清初学派中的主流^③，这些学派都应当深入研究作各别的论述和评价，我在这里仅举当时的学风和顾黄王诸家其学派中的特点。

他们同在复明抗清民族斗争的目标下，贡献出他们学术上的主张和一生的力量。他们虽不住在一个地方，可是他们的学问有相同之点，如黄宗羲所著的《明夷待访录》，当时顾炎武看

① 参考梁份：《怀葛堂文集》；刘继庄：《广阳杂记》。

② 参考吕留良：《吕晚村文集》。

③ 参考江藩：《汉学师承记》；徐世昌：《清儒学案》。